

近百年国内藏式佛塔研究综述

陈祎韬,李顺庆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藏式佛塔是藏传佛教的标志性建筑,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历史悠久且文化内涵丰富,在藏区僧俗信众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在倡导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藏式佛塔作为藏族文化的代表,更应挖掘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近些年,众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藏式佛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进一步推动藏式佛塔的研究,对国内近百年来有关藏式佛塔的研究进行回顾,在分析以往研究状况的基础上,评述近百年来国内藏式佛塔研究问题与不足,为今后深入研究藏式佛塔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照坐标。

关键词:藏传佛教;佛塔;青藏高原;建筑文化

中图分类号:TU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2)03-0055-07

自佛教东流,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在中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所形成的建筑风格也截然不同,尤其以佛塔的差异最为显著。藏式佛塔(མཚན་རྟེན། mchod rten)也称“喇嘛塔”,源自古印度的“窣堵坡”(英音译“Stupa”),作为青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僧俗信众寄托宗教情感的场所。梁思成先生所说“建筑之始,产生于实际需求”^[1],佛塔最初实际需求便是作为僧徒圆寂后的坟冢。

在佛教中有身语意“三门”的理念,“佛像是身所依,佛经是语所依,佛塔是意所依。佛塔作为三所依之一,与佛像佛经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2]³⁰²。在《佛说造塔功德经》中也指出:“其人(造塔之人)功德如彼梵天,命终之后生于梵世”,可见建造佛塔是功德无量的事情^①,所以佛教进入西藏之初就伴随着佛塔的营建,尤其在藏传佛教文化深入民间的后弘期,藏式佛塔就成为藏传佛教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加之元明清三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支持,筑寺建塔活动更为频繁。

藏式佛塔是一种宗教建筑,属建筑学;但建筑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品,在建造过程中注入了各种

文化因子,具有了文化代表性。藏式佛塔更是超越建筑本身,融合了藏族的建筑工艺、审美习惯和内涵。目前藏式佛塔研究的学者学科背景广泛,包括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建筑学和艺术学,也有相当数量的旅行者与专访记者。为进一步推动对藏式佛塔的研究,本文拟对近百年国内藏式佛塔研究状况作一梳理,为今后研究提供较为实用的参照。

一、1949年之前藏式佛塔研究

藏式佛塔是藏区最常见的宗教建筑。在建国前,由于青藏高原遥远而难以到达,所以对藏区藏式佛塔的研究较少,但内地零星分布的一些藏式佛塔受到了重视,出现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从现代学术角度对藏式佛塔的研究开始于梁思成先生对古建筑考察之时,梁先生注意到内地为数不多的藏式佛塔建筑,于抗战期间写成著名的《中国建筑史》,其中在《元代砖石建筑》中记录了元代所建安阳天宁寺塔、安阳白塔和北京妙应寺塔。注意到天宁寺塔顶以喇嘛塔为刹的特点,而其塔身则是单层多檐塔形制,具有汉藏建筑文

收稿日期:2021-12-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清代的藏传佛教策略与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寺院管理研究”(16XZJ007);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资助项目“汉藏交融视域下《善逝身像量度论》中藏式佛塔中国化研究(2021KYZZ02013)”

作者简介:陈祎韬(1995-),男,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藏族文化;李顺庆(1965-),男,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佛教文化。E-mail:cyt1639200227@163.com

化交融的特点;通过实地考察,确定是安阳白塔为“元代最古之瓶式塔也”;最后对北京妙应寺塔做了形制研究,为元代藏式佛塔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3]193-197}。其后在《明代佛塔及其他砖石建筑》^{[4]211-216}中记录了五台山塔院寺塔、昆明妙湛寺金刚宝座塔^②。最后在清代篇章《砖石塔》中记录了著名的北京北海佛塔、北京法海寺门塔和碧云寺塔,指明北海佛塔受到蒙古喇嘛塔的影响,重点对碧云寺塔建筑进行测绘记录,留下了科学的数据资料^{[5]244-247}。

建国前,对青藏高原难以进行深入科学考察,所以相关资料以游记为主。1914年周希武到玉树进行勘界调查,历时八九个月,遍访土司、僧侣、牧民,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于1920年出版了《玉树调查记》,在其中宗教篇章中重点介绍了玉树的拉布寺^③，“有鎏金巨塔，自地上出，嵌以宝石，维以色帛塔顶，以木作偃月，呈日状饰，以汞楼下所见金光灿烂者，即塔之下半也，塔左右有两甬亦自地上出色帛曾裘如华盖然，番名摩尼”^{[6]11}，可以和图齐于20世纪30年代在西藏西部所考察藏式佛塔相对比来研究^{[7]30-32}。在康藏方面，1929年任乃强先生深入西康11县区进行考察，其后写成《西康图经》，其中民俗篇章中提到了一种“叠石奇技”，就是能用乱石来砌墙，由于一些藏式佛塔就是以石头堆成，这为研究大型藏式佛塔的建造技术提供了参考资料^{[8]254-253}。于1929年受命出使西藏的国民政府书记官刘曼卿女士，入藏后分别到访过罗布林卡、拉萨三大寺、江孜白居寺等地，拍摄了大量照片，包括了著名的白居寺佛塔等藏式佛塔，相较于文字，这些摄影资料更直接，也更为珍贵，都记录在《康藏轶征》一书中^{[9]53,70-74}。1949年以前，涉及藏式佛塔的报告与游记还有：刘如虎的《青海西康两省》^{[10]46}和杨希尧的《青海风土记》^{[11]65}等，但都只是简单的记录和描述，未能专门和深入研究。

总体来说，1949年以前除梁思成和其他少数学者对藏式佛塔做过初步的研究之外，大部分调查报告和游记是在描写风土人情的基础上记述的，内容较少，对藏式佛塔的研究当时还处在认识和介绍阶段。

二、1949年之后藏式佛塔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主改革和民族识别等工作推进，藏区的文物古迹和寺院遗址受到了重视，一些专业学者前往藏族聚居区进行考察，成果中包括了大量佛塔资料。改革开放后，对藏式佛塔背后历史文化意义的挖掘成为热点，出现了较为深刻的研究成果。随着新世纪进藏交通的完善，方便了许多学者入藏考察，对藏式佛塔所蕴含艺术价值的研究成为一种趋势，直至现在，研究的视野更是不断地拓宽，多元化多角度的研究日渐蓬勃。

1. 关于藏式佛塔实地考察的资料

众所周知，内地也存着一些藏式佛塔，建国后学者们开始更深层次研究。梁思成于1961年发表的《中国的佛教建筑》一文，指出“十三世纪中叶以后，在汉族居住的地区出现了西藏式的瓶形塔”，明晰了藏式佛塔进入内地的时间^[12]。建筑学家刘敦桢在《覆艾克教授论六朝之塔》中谈到我国六朝、隋唐木塔建筑特点时，提到北平西郊僧塔，外观是喇嘛塔式，但有中心柱直达底部，证明了在修建藏式佛塔时也会用到隋唐以来的建造手法，即中心柱之制^④。通过这些研究，推动了藏式佛塔的研究深度，为存在于内地的藏式佛塔提供了研究资料^{[13]251}。

在梁思成、刘敦桢等开创汉式古建筑调研方式的基础上，宿白先生以考古学视角，探索西藏不同时期佛寺佛塔的建筑形态发展过程，在藏式古建筑研究领域具有开创之功。西藏解放初期，宿白与王毅同赴西藏展开文化遗产的调查，宿白发表有《西藏日喀则寺庙调查记》^[14-15]和《西藏山南地区佛寺调查记》^{[16]311-339}等文章，王毅也发表了《西藏文物见闻记》^[17-18]。《西藏日喀则寺庙调查记》记录了夏鲁寺、萨迦寺和雪囊寺中的佛塔，绘制了许多精准的速写图稿，首次运用建筑考古的方法研究藏式佛塔。王毅在《西藏文物见闻记》中记录了拉当寺几米罗布桑查塔、康玛云囊寺门外砖塔以及白居寺大菩提塔，对佛塔的细节（如塔基所绘纹样等）处留下了影像资料，鉴于有些佛塔后来被毁，这些资料弥足珍贵。

改革开放后,随着各地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有很多藏式佛塔遗址、包含藏式佛塔的摩崖石刻或壁画被整理出来。1987年发表在《文物》杂志的《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就包含了几座藏式佛塔的资料^[19]。在黑水城外围城墙上共有五座藏式佛塔,因筑于元代,对元代西夏地区藏式佛塔形制风格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⑤。1991年的《宁夏青铜峡市一百零八塔清理维修简报》中^[20],通过对藏式佛塔群的维修整理,认定这群藏式佛塔是建于西夏时期,“始建的上坏塔,其字折角形墓座、圆肚式塔身,为较早的藏传佛教覆钵塔的形制”,不仅丰富了西夏时期西北藏式佛塔的资料,还对于佛塔数何为一百零八进行了深入探讨^⑥。《甘肃武威市白塔寺遗址1999年的发掘》也是一份很有价值的资料,白塔寺见证了使西藏归入中央王朝直接管辖的凉州会盟,所以佛塔属元代早期风格,提到“该塔(白塔寺白塔)为西藏噶当觉顿式,其形制与北京元代尼泊尔工匠阿哥尼设计、八思巴之弟益邻真主持修建的妙音寺白塔寺大体相似”,为元代萨迦风格佛塔传入内地的研究提供了例证^[21]。另外在青藏高原腹地,对很多包含藏式佛塔内容的遗址也进行了考古调查,1979年文物刊发《阿里地区古格王国遗址调查记》,解开古格王国遗址神秘的面纱,无论是实体的藏式佛塔遗址还是壁画所含藏式佛塔,数量都很多,属于独特的西藏西部艺术风格,对于后弘期早期西藏西部佛教文化种类的研究很有帮助^[22]。2007年《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白东波村早期佛教遗存的考古调查》,调查报告中记录了札达县白东波村和增撒地点佛教遗存的多处佛塔,佛塔都是以塔群、塔林的形式分布,包括了吉祥多门塔、天降塔样式的佛塔,是古格王朝时期的建筑,“大体上为一种‘塔院式’的伽蓝配置,以寺院居中,前后为佛塔,”这份资料对于藏传佛教早期塔寺关系有重要意义^[23]。2017年由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调查的《青海称多县歇武镇格日村宋代佛教摩崖石刻考古调查简报》,其中有三处线刻佛塔,通过题记,最终判定这处线刻佛塔是北宋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通过该材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元代之

前萨迦派佛塔风格^[24]。专门关于藏式佛塔或附带藏式佛塔的考古调查成果还有很多,如蒋超年等^[25]、仝涛^[26]、夏吾卡^[27]的考古调查报告都是研究藏式佛塔的材料来源之处,需特别关注和整理。

2. 藏式佛塔历史源流及形制发展的研究

藏式佛塔一般被认为是源于古印度的“窣堵坡”,但关于藏式佛塔的形制演变和发展的研究,现今还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并未取得较为统一的结论。尕藏加^[28]认为松赞干布(617-650)时期,佛塔随佛教由印度传入西藏,“坐落在西藏最早建立的佛殿——昌珠寺内(佛塔),这是藏族人自己在本土创建的第一座佛塔,”另外提出了“灵塔在形制上多采纳八塔中的殊胜(或尊胜)塔、神降塔(或天降)塔和菩提塔三种类型”的观点^⑦。根秋登子^[29]认为藏式佛塔有苯教塔文化因素的注入,具体为:“它(藏式佛塔)的塔基和塔座是原苯教时期雍仲庄严塔的狮座部分加宽加高组成四角、八角和多角塔座”和“象征日夜常明的日月和顶饰宝珠等组合而成”,是佛苯结合的产物,提供了一种从苯教塔出发来研究藏式佛塔视野。索南才让^[30]认为“西藏佛塔无论名目多么繁多,造型多么不同,但均源自为纪念佛陀功德而建的‘八灵塔’形制,”后来所建造的藏式佛塔,属同源异流。但廖旻^[31]对此提出了质疑,虽然“天降塔”(八灵塔之一)塔座的四层阶级以往被认为是纪念佛至忉利天为母说法后,降下阎浮提所踏的三道宝阶,其实“(天降塔)并非根据印度的某座塔所仿建,而是塔所体现的象征体系的重构”。也就是说天降塔最初只是单纯的具有阶级,没有与佛至忉利天为母说法的情节相联系,所以也就没有纪念意义,“因此现阶段把它们视作‘具阶梯塔’更为确切”。冯智^[32]、拉都^[33]、龙珠多杰^[34]⁵⁸⁻⁷⁸等也有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

藏式佛塔建筑的背后不仅是历史文化的呈现,更是藏族同胞审美习惯和艺术追求的表达。目前,藏式佛塔形制演变一直是热门的话题。这方面首推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著作分为西藏寺院、甘青内蒙古寺院和内地藏传佛教寺院三个部分,在甘青内蒙古寺院这一部分中,呈现了明朝之前藏传佛教佛塔艺术一路向北的传播情况,依据佛

塔覆钵体的不同,将藏式佛塔在西夏和元时的特点分为四类,学术价值极高^{[35]305-365}。其次,张亚莎等^[36]通过青藏高原及周边岩画中佛塔形象的整理,总结出西藏岩画塔图形演变五个阶段,对藏式佛塔中苯教元素的探究提供了科学可靠的线索^⑧。廖昉^[37]着眼于藏式佛塔发展最关键的14世纪,指出布顿(1290-1364)在设计藏式佛塔时,并“没有采用其主张的八塔名目,而其塔样亦体现出西藏本土的考量”,从中窥见西藏艺术臻于成熟定型并形成自我体系的时代风貌。另外,也有学者从历史文本入手研究佛塔,沈卫荣^{[38]261-296}对布顿著作《大菩提塔样尺寸法》进行了对勘和研究,认为布顿造塔思想来源于《律小事》^⑨和《无垢顶髻梳文》^⑩,但不是简单地将“两个段落拼合在一起而已,而是有其自己的取舍和评判的,”与廖昉的观点不谋而合,对藏式佛塔的本土化有启发意义。另外,廖昉^{[39]317-368}、王宏利^[40]以及贾维维^[41]都有研究藏式佛塔形制演变的成果。

关于藏式佛塔文化的另外一种特殊的载体是擦擦(ཅེ་ཅེ། tsha tsha)。擦擦是一种藏族的宗教艺术品,其最初功能是充当佛塔塔腔内的佛教圣物,包括小型佛像和佛塔的题材,正因如此,便成为藏式佛塔重要的研究对象。但相关的研究国内起步较晚,较早的研究是2005年索南才让^[42]介绍了擦擦与佛塔关系的发展,指出“佛塔形象是‘擦擦’的主要图案,尤其是‘天降塔’和‘菩提塔’,”为善逝八塔的历史演变研究提供了具体的线索。张建林^[43]提到“覆钵式圆雕塔(佛塔擦擦)不仅同时代唐王朝统辖地区没有见到,就是西藏10世纪以后也不再出现。……完全是印度样式”,这对于早期西藏佛塔本土化问题研究很有价值。吴雪梅^[44]和章治宁^[45]等,也都是从擦擦的角度来研究藏式佛塔。

3. 藏式佛塔的建筑学研究

关于建筑方面,藏式佛塔也有独到的营建技术和美学定位,吸引了无数游人与学者,因此,从该角度研究藏式佛塔的成果较为丰硕。2007年由陈耀东编著的《中国藏族建筑》是一部专业性极强的著作,最具特色的是从建筑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

不同历史时期藏式佛塔塔基、塔身、塔刹三者比例的变化,尤其深入分析了后弘期西藏受中央直接管辖后,萨迦派风格到格鲁派风格佛塔量度比例的具体变化,并附有量度图作为参照,这为藏式佛塔本土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支撑^{[46]208-217}。近些年专门研究藏传佛教建筑的是南京工业大学的汪永平教授,2005年曾出版专著《拉萨建筑文化遗产》,在第三章拉萨宗教建筑中就整理了拉萨藏式佛塔分布,也绘制了部分佛塔图纸,但因地域所限,整理的藏式佛塔数量较少,种类也有限^{[47]123-130}。后于2017年出版了由汪永平主编,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的“喜马拉雅”丛书^⑪,包括了拉萨、日喀则、江孜以及阿里等地区的藏传佛塔,汪永平团队经过长期实地深入偏远地区进行建筑调查,尤其是对西藏西部和西藏以西的拉达克等地区藏式佛塔田野调查和记录,几乎涵盖了环喜马拉雅山脉地区藏式佛塔的资料,建立了相关建筑档案。另外,萧默的《敦煌建筑研究》中专门有一节从建筑美学角度分析敦煌石窟中的几种“喇嘛塔”,其中提到了一种藏式佛塔为每层须弥座上沿的转角处都带有山花蕉叶做尖角翘起之状,为一种元朝以来流行于西北的藏式佛塔风格,为西北地区藏式佛塔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48]203-207}。在对藏式佛塔塔刹的研究中,吴庆洲^[49]总结了藏式佛塔塔刹的演变,即“由元代的一个小型窠塔波演变为清代的日月刹和铜葫芦刹”,逐渐融入了中国文化元素,佐证了藏式佛塔中国化的问题。杨嘉铭等^{[50]134-139}、龙珠多杰^[51]、莫日根^[52]等也都从建筑美学入手分析藏式佛塔,解释了藏式佛塔建筑中藏文化表达的手法和技艺。

也有从特殊藏式佛塔类型入手研究的,如周晶等^{[53]150-211}将以往被忽略的藏式大型佛塔做了整理,运用现代建筑考古学方法和技术,归纳了多门塔的历史文化信息和营造技术信息,对藏式佛塔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重要价值。总之,从建筑美学角度研究藏式佛塔的成果越来越多,虽然目前很多文章仍以客观描述为主,但研究愈来愈具有深度,探讨方向也越来越细化具体,处于向前发展的良好状态。

三、藏式佛塔研究现状的评述与展望

综上所述,当前藏式佛塔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在近些年,深刻性和广泛性都有很大的提升,尤其是更多的研究团队深入青藏高原腹地去做相关田野调查和考古调查,成果十分丰硕。可以预见,随着藏式佛塔基础性材料被更广泛收集和系统整理,加之国家加强民族文化自信战略的推进,藏式佛塔将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研究中关键组成部分,研究会更活跃,就目前关于藏式佛塔的研究而言,虽已有很大的进步,但也存在一些欠缺和不足,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1. 目前关于藏式佛塔基础材料尚少

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关于藏式佛塔的藏文文献翻译较少,藏式佛塔的建造是一种技艺,属于藏族文化“十明”^⑩中的工巧明,其中大量关于藏式佛塔文化理论和修筑技术的资料尚未被翻译,导致基础材料缺乏整体性,无疑成为藏式佛塔研究的一个阻碍。第二,在寺院或石窟壁画、岩画、特殊的塔形擦擦甚至于经书封盖画之中包含大量藏式佛塔题材,这些都是研究藏式佛塔重要的原始资料。遗憾的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专门就这些材料做系统整理。因此,若要进一步加深藏式佛塔研究,应十分注重对基础材料的搜寻,最为关键的是需要具备藏语能力的学者翻译相关藏文文献,再进行科学归纳整理,细化藏式佛塔研究的领域和方向,做到各个击破,从而形成系统全面学术成果,更好地推进藏式佛塔研究。

2. 研究的角度较为局限,分散性明显

建筑学者着重于对其建筑学的研究,历史学、民族学学者侧重于历史民族文化的探索,而艺术家则偏重艺术角度分析,研究成果分割性明显,不同学科间相互交集较少,缺乏应有的融通,严重制约了藏式佛塔研究整体水平。在未来的藏式佛塔研究中,应吸纳各科学者,组成专业团队,对藏区藏式佛塔展开全面、系统地实地调查。另外,在当今倡导多角度、跨学科学术研究的时代,学者可借鉴多学科研究方法,综合以用之,加强藏式佛塔研究

的整体性。例如可以将建筑学建模软件和人文历史的传统研究方法二者相结合,具象地表达出藏式佛塔的文化内涵,甚至将文献中的藏式佛塔样式复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3. 关于藏式佛塔本土化的问题尚未得到重视

佛塔在青藏高原经历千年的发展,已由“印风”佛塔发展成为本土化的藏式佛塔,尤其元代以来西藏受中央直接管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同中原频繁交流下,加速了本土化历程,产生了以布顿(1290-1364)《大菩提塔样尺寸法》为代表的本土化理论著作。从这个层面理解,这种本土化的传承就是一种中国化的体现,这不仅仅是佛塔自身简单的形制变化,更是西藏文明向东发展和中原文化继续交融的结果。但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藏式佛塔本土化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重视,缺乏深层次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交融的挖掘。在今后藏式佛塔的研究中,不仅只研究其本身的文化内涵,更需结合西藏同中原交往互动的宏观背景,将藏式佛塔本土化问题重视起来,挖掘本土化和中原文化之间的联系,将背后的文化交融互动梳理出来,加强藏式佛塔的研究深度,构建出完整的藏式佛塔发展脉络。

参 考 文 献

- [1] 梁思成. 中国建筑之特征[C]//梁思成文集:三.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
- [2] 蒲文成. 青海佛教史[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
- [3] 梁思成. 元代砖石建筑[C]//梁思成文集:三.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
- [4] 梁思成. 明代佛塔及其他砖石建筑[C]//梁思成文集:三.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
- [5] 梁思成. 砖石塔[C]//梁思成文集:三.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
- [6] 周希武. 玉树调查记[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
- [7] 图齐. 梵天佛地:第一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8] 任乃强. 西康图经·民俗篇[M]. 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
- [9] 刘曼卿. 康藏轶征[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 [10] 刘如虎. 青海西康两省[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11] 杨希尧. 青海风土记[M]. 南京:新亚细亚学会出版

- 社,1933.
- [12] 梁思成. 中国的佛教建筑[J]. 清华大学学报,1961,8(2):51-73.
- [13] 刘敦楨. 覆艾克教授论六朝之塔[C]//刘敦楨文集:一.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
- [14] 宿白. 西藏日喀则寺庙调查记:上[J]. 文物,1992(5):32-42.
- [15] 宿白. 西藏日喀则寺庙调查记:下[J]. 文物,1992(6):24-34.
- [16] 宿白. 西藏山南地区佛寺调查记[C]//李铮,将忠心. 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 [17] 王毅. 西藏文物见闻记:2[J]. 文物,1960(Z1):52-65.
- [18] 王毅. 西藏文物见闻记:4[J]. 文物,1961(1):43-53.
- [19] 郭治中,李逸友. 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J]. 文物,1987(7):1-23.
- [20] 雷润泽,于存海. 宁夏青铜峡市一百零八塔清理维修简报[J]. 文物,1991(8):27-35.
- [21] 魏文斌,李明华,王辉,等. 甘肃武威市白塔寺遗址1999年的发掘[J]. 考古,2003(6):52-69.
- [22] 人增多吉,张文生. 阿里地区古格王国遗址调查记[J]. 文物,1981(11):30-36.
- [23] 霍巍,张长虹. 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白东波村早期佛教遗存的考古调查[J]. 文物,2007(6):69-83.
- [24] 朱德涛,蔡林海. 青海称多县歇武镇格日村宋代佛教摩崖石刻考古调查简报[J]. 藏学学刊,2017(1):164-182.
- [25] 蒋超年,赵雪野. 武威亥母寺遗址01窟覆钵式佛塔年代探讨[J]. 西夏研究,2017(2):88-92.
- [26] 仝涛. 丝绸之路上的疑似吐蕃佛塔基址——青海都兰考肖图遗址性质刍议[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7(2):100-109.
- [27] 夏吾卡先. 巴基斯坦北部及其邻近区域所见吐蕃遗存的整理研究[J]. 中国藏学,2020(2):181-194.
- [28] 尕藏加. 藏式佛塔考述[J]. 中国藏学,1996(3):122-129.
- [29] 根秋登子. 论藏式佛塔建筑[J]. 中国藏学,2004(2):92-94.
- [30] 索南才让. 论西藏佛塔的起源及其结构和类型[J]. 西藏研究,2003(2):82-88.
- [31] 廖昉. “天降塔”辨析[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1):6-24.
- [32] 冯智. 西藏早期藏式佛塔文化[J]. 西藏民俗,1998(2):26-29.
- [33] 拉都. 藏传佛塔的起源及其象征[J].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3):1-6.
- [34] 龙珠多杰.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研究[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1:58-78.
- [35] 宿白.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 [36] 张亚莎,龚田夫. 西藏岩画中的“塔图形”[J]. 中国藏学,2005(1):70-79.
- [37] 廖昉. 从夏鲁寺东无量寿宫回廊壁画看布顿对藏式佛塔的贡献[J]. 民族研究,2019(4):80-94.
- [38] 沈卫荣. 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大乘要道密集》研究初编[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39] 廖昉. 狮柱与佛塔——从印度到中国的演变[C]//艺术史研究:第十四辑. 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
- [40] 王宏利. 藏传佛塔的形制及其特点[J]. 五台山研究,2001(3):18-20.
- [41] 贾维维. 宋夏河西地区“八塔变”图像的来源与流布[J]. 文艺研究,2019(8):127-139.
- [42] 索南才让. “擦擦”与佛塔[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6):112-114.
- [43] 张建林. 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擦擦的特征——兼谈吐蕃擦擦[J]. 中国藏学,2010(S1):23-31.
- [44] 吴雪梅. 10-13世纪“八塔变”擦擦在西夏地区的流传[J]. 西夏研究,2021(3):50-57.
- [45] 章治宁. 西夏塔式擦擦造像艺术[J]. 西夏学,2019(1):138-146.
- [46] 陈耀东. 中国藏族建筑[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 [47] 汪永平. 拉萨建筑文化遗产[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 [48] 萧默. 敦煌建筑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49] 吴庆洲. 佛塔的源流及中国塔刹形制研究(续)[J]. 华中建筑,2000(1):130-137.
- [50] 杨嘉铭,赵心愚. 西藏建筑的历史文化[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
- [51] 龙珠多杰. 藏式佛塔建筑的象征体系探析[J]. 古建园林技术,2016(2):43-48.
- [52] 莫日根. 内蒙古席力图召藏式佛塔建筑艺术[J]. 中外建筑,2016(5):36-38.
- [53] 周晶,李天. 雪山中的曼荼罗:藏传佛教大型佛塔研究[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A Review of Tibetan Stupa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CHEN Yi-tao, LI Shun-q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ibetan stupa, widely distributed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the symbolic building of Tibetan Buddhism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a lofty position in the hearts of Tibetan monks and laymen. In the new era of advocating national cultural confidence, Tibetan stupa, the representative of Tibetan culture, should be explored for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artistic value. In recent years, many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in-depth studies on Tibetan stupa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Tibetan stupa in China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and comments on the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status with the view to providing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ibetan stupa.

Key words: Tibetan Buddhism; stupa; Qinghai-Tibet Plateau; architectural culture

【编辑 高婉炯】

注释:

- ① 建造佛塔的功德可谓至高无上,《佛说造塔功德经》还提到:于彼寿尽,生五净居,与彼诸天等无有异。《佛说造塔功德经》出自《大正藏》第16册,经号699,第801页。另外,在《佛说造塔延命功德经》也提到:一切鬼神不敢逼近。五星七曜随顺驱使。一切怨家悉皆退散。随所生处身常无病。一切众生见皆欢喜。无净戒者净戒满足。不调伏者能令调伏。不清净者能令清净。破斋戒者斋戒复生。若犯四重及五无间极重罪业悉得消灭。无始劫来障累皆尽。出自《大正藏》第19册,经号1026,第726页。
- ② 金刚宝座塔源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古印度,阿育王为纪念释迦牟尼,在此菩提树下修建了精舍,后逐渐建成佛塔,金刚宝座塔与密教曼陀罗有着紧密的关系,鉴于密教是藏传佛教最大特点,但关于藏传佛教密教和金刚宝座塔是否有着直接联系,此问题还需探索。
- ③ 拉布寺为青海玉树地区格鲁派大寺之一,建寺之初为萨迦派,后改宗格鲁派。同治年间,西宁办事大臣锡英赐予“普济寺”匾额。详见蒲文成《甘青藏传佛教寺院》第333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 ④ 《高僧传·慧受传》载:“初立一小屋,每夕复梦见一青龙,从南方来,化为刹柱,受将沙弥至新亭江寻觅,乃见长木随流而下,……于是雇人牵上,竖立为刹,架一层,道俗竞集,咸叹神异”。可见中心柱是汉传佛教建塔的一项重要,但此处所记录的藏式佛塔也使用了中心柱,中心柱建造技巧是何时开始影响藏式佛塔的建设,可做探究。
- ⑤ 宿白先生的《西夏古塔的类型》中,将黑水城发现的藏式佛塔类型归类为ⅦA型,既覆钵塔身作覆钟式。相类似的藏式佛塔在河西走廊地区存在很多,榆林窟元代第4窟北壁西侧处所绘藏式佛塔,还有马蹄寺北寺3窟内的几处石刻佛塔等等,虽然基本形制是一致的,但在一些细节方面还是有很大差异,比如有些藏式佛塔每层须弥座上沿的转角处都带有山花蕉叶做尖角翘起之状,所以关于西夏和元初西北地区藏式佛塔还需深入研究。
- ⑥ 与宁夏一百零八塔相似的还有西藏阿里托林寺一百零八塔,依次南北排开,一百零八这个数字在藏传佛教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这个数字在造塔中的体现,表现了该地区藏传佛教文化的繁盛。
- ⑦ 在2021年第4期《西藏研究》中廖旸的《灵塔与法脉传承——青海玉树杂多吉日沟塔群初探》一文中,展示了该遗址中灵塔的多重功能,灵塔的塔座上绘有大量壁画,包括了噶举派的法脉传承图,体现了灵塔法脉传承的功能性。
- ⑧ 青藏高原地貌中岩石遍布,“石文化”发达,存在着大量的岩画,其中包括许多“塔样式”的岩画,经张亚莎研究,这些“塔形图”是属于原始苯教的一种表达,对后来的藏式佛塔文化有着一定影响,通过阿里、那曲与玉树三个区域岩画的对比研究,整理分类了大量塔形图,玉树地区岩画包括了天线塔形图、牛角塔形图以及神鸟塔形图,可见苯教塔对藏式佛塔具有一定的影响。详见张亚莎、邹沁园《玉树白龙沟岩画与苯教文化关系研究》,《中国藏学》2020年第2期,第75-83页。
- ⑨ 《律小事(Vinayaksudrakauastu)》,《西藏文大藏经》,北京版,律部,ibl-ne 316a8, No. 1035。有关造塔之各类藏文文献参见 Pema Dorjee, *stūpa and its Technology: A Tibeto-Buddhist Perspective*, New Delhi: Indra Gandhi National Center for the Arts, 1996。
- ⑩ 见于德格版《西藏文大藏经》,续部,卷 Thu, Toh, No. 2688。
- ⑪ 《喜马拉雅城市与建筑文化遗产丛书》是一套介绍喜马拉雅文化圈内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城市与建筑的丛书,囊括了喜马拉雅文化圈内各个国家和地区从历史到发展再到现今的建筑文化状况。
- ⑫ “十明学”是对大五明和小五明的总称。大五明包括内明(佛学)、因明(逻辑学)、声明、医方明和工巧明(工艺学)。小五明包括星象学、修饰学、辞藻学、韵律学和戏剧学。藏式佛塔就属于工巧明。